

[美] 周明之 著
雷 颐 译

胡适与中国 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适与中国 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美] 周明之 著
雷 颐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美)周明之著;
雷颐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ISBN 7-5633-5145-0

I. 胡… II. ①周…②雷… III. 胡适(1891~1962) — 人物研究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25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邮政编码: 102612)

开本: 960mm × 130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7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8 000 定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译本自序

〔美〕周明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先生,把我的英文著作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译为中文。因为雷先生的翻译,所以我的书,才能以中文和中国的史学界见面。我除了表示谢意之外,也借这个机会,把本书的主旨,简略说明。

本书不是胡适的全传。以胡适生命的复杂和牵涉的层面之广,写全传所需要的篇幅,怕要多过本书的一两倍。我所采取的,是主题性的分析。全书的中心,是分析胡适在晚清和民国时代以来的新旧交替与中西激荡的环境之中,所产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胡适出生时(1891,清光绪十七年),中国早已处在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传统价值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已开始在本质上起变化,而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在新旧交替之下,正在崩离瓦解。有思想、有感性的知识分子,在新旧和中西之间的取舍,在价值取向和个人前途的选择时,在在都遭遇到极大的困扰。

胡适自小受新式教育,又在近十九岁时游学美国,首尾年,浸淫之深而久,在现代的思想领域里,在他同时代的人物之中,

少有出其右者。可是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胡适对中国有一份自然而深厚的情感,然而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政治的理想和实际,在强大而先进的西方标准对比之下,又使他感到虚弱而不愿与中国认同。在这种新旧和中西的交煎之下,个人行为 and 思想的选择,不再可能是截然明白的了。胡适接受了近代的新思想,而对和新思想有冲突的旧成分,却不能全然舍弃。他对中国的现代政治和社会,深恶痛绝。然而他严酷的批评,却正反映了他对中国的关切之深。这也正说明何以许多有思想和感受敏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往往陷入不可自拔的疏离感的深渊之中。

综观胡适的一生,无论他身在何处,都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他在上海离开中国新公学之后,开始过糜烂的日子。当时旧的仕途已绝,而新式高等教育还没有起而代之。他苦读英文,至少在潜意识上,已在向往留学美国。而另一方面,他又批评美国对华心怀不善。胡适在内心交战彷徨之余,生活也不检点了。胡在上海时,便在数学上加倍用功。到了美国,又专修农科。而他真正的兴趣,却在文史。科学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不只是学科而已,而是一种价值观。胡适立志做科学家,多少有脱离中国的价值世界的欲望。他在康奈尔大学时,当了基督徒又即时反悔。以后一面批评基督教的教义和传教士的行径,而一面又承认传教士在中国现代化上的贡献。胡适的婚姻,是中西和新旧冲突最突出的例证。他于1904年初,十三岁出头时,以媒妁之言与江冬秀订终身。他到了美国,在自由的气氛之下开始自由恋爱。虽然终于和江冬秀成婚,然而以后力主离婚的自由和妇女的解放,大半都是他自己不可告人的伤心痛事之中的了悟和他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传统的抗议。胡适信服大同主义,只问是非正义而不受民族感情的羁绊。可是大同主义,又自有其巧妙之处。他在世界大同和国际公理的理论之下为祖国

辩护,反而觉得自在如意。不过胡适组党绝对不为,从政也非心甘情愿,和当时丑恶的中国政治,始终保持距离。这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一心一意入仕途,其志趣互异是显而易见的。胡适的文学革命,是对旧文学和旧价值观的基本性批评,而其主张写实主义,更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中之种种恶习的大力控诉。胡适在基本上是反传统的,不过他的心情极为复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他对古史的喜好,一方面是要替中国找现代化的历史先例,一方面是他对文史的兴趣,一方面是要在故纸堆里躲避现实和找寻暂时的寄托。胡适终其生而没有找到他自认为自在而满意的角色。

本书首尾,均以分析和解释为主。我的目的,是在增加我们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了解。所谓了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情的了解。书中不作道德性的褒贬,更没有政治性的颂扬和谴责。历史是我们的记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没有记忆,则我们对今天的自我从何而来,以及今从何去,都一无所知了。我们之所以能有正常的行为和规律的生活,知道几点起床,几点上学,办公室何在,明天的计划如何,都是我们有记忆,因为我们的记忆给了我们一个规律和方向。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历史的记忆,也不会有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的。相反,如果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太仔细、太琐碎,一样也会使我们瘫痪。过与不及,弊害其一。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的束缚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同时要具备对过去的记忆的能力和忘记过去的能力(ability to forget),才能维持一己的健康。试想如果一个民族,以它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去记忆过去的一分一秒,一点一滴;如果一个人,记得他过去的一举一动,甚至每餐饭的时间,至于分秒不差,则这个民族和个人,有何智慧和判断可言? 则他们哪

里会有任何创造力和想像力?①

我们中国的史学界,一方面记忆不够,许多失去的记忆,要追回已不是易事。而另一方面又患记忆太好的毛病。这种记忆太好的缺点,除了见之于无数的堆积史实,机械性而无内容的研究之外,最明显的,是见之于和古人计较的习惯。我们对于古人的功过是非,记忆恒新,点滴枝节必不放过,至于黑白分明而后已。所以我们无时不把我们想当然的道德观,强加之于古人,定他们的功罪。近几十年来,更无时不以盲目的政治教条,作为判刑和褒扬的尺度。可惜这种道德和政治的功过褒贬,只是使我们的历史记忆,变得支离破碎,而并没有增进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把古人放在严格虚无的天平上衡量,结果只是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一切。我们为民族社会所留下的,几乎都是自我贬抑的集体记忆而已。

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以平和的心情,客观的态度,在适当的距离之下,研究过去,保存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 1632—1677)说,我们研究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Smile not, lament not, nor condemn; but understand)②。是哉斯言。

1988年除夕

美国纽约之绮色佳,康奈尔大学

① Walter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44—145.

② 转引自 Erne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Fritz C. 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X.

译者序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我长期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所以初读周明之先生的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即为其丰富的史料和深刻的分析所吸引，而且当时国内对胡适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发轫未久，深感此书当有意义殊深的启发作用。当 1988 年夏有家出版社决定出书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我便力荐此书，并自告奋勇担起翻译重任。

译毕全书，却颇为书名的译法犯难。“Intellectual”通译为“思想”，这固然不错，但我总感不完全“恰如其分”，因为汉语中的“思想”要比“Intellectual”宽泛得多，“Intellectual”似乎更偏重于知识、理性、智力等，比“思想”要“单纯”不少，直到现在，我仍未找到一个非常贴切、满意的译法——近见有人将其译作“智性”，足见不满将其译作“思想”者大有人在。与出版社责编商量后并经周先生同意，决定将书名由“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想的选择”改译为“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因为此书虽是以胡适为中心，却对从胡适到傅斯年、徐志摩、丁玲等人的人生道路、职业选择、爱情观、信仰的变化与坚守等都作了细致分析，实际上透视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且，“Intellectual”本有“知识”之意，“Intellectuals”即“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当

时正是国内思想、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热”：“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与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到受教育者的角色转换……争论不休。

好事多磨，此书终于在1991年出版面世，当然印制极其简陋，印数亦少得可怜。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此书虽然出版，但仅如在巨大的虚空中投下一粒小小的沙石，难有反响，仍是浓重的沉寂。

然而近年来，对胡适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却在不断升温，那一代人面对的“困局”，似乎重又叩扰着当下“读书人”的心灵。他们面对现实政治那种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处境，对传统文化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复杂矛盾心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甚至他们对家庭、婚姻和爱情的态度，在在又引起激烈争论。而周明之先生的大作，将大动荡时代背景下“乱世儿女”们特有的无奈，那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妥协甚至幻灭、激情的勃发与冷却进而转为令人心悸的自嘲，都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这部力作，将使我们今天的思考与争辩更加深刻，而不是流于随感，更不是“非此即彼”地简单苛责或颂扬。那一代人早已风华不再，从纷繁炽烈的时代大舞台怆然谢幕退场已久。不过，他们繁华褪尽的身影，却一直时显时晦浮现在虽无喧嚣但更加深沉阔壮的历史舞台，郁郁然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结”。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此书。相信此书将给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带来新的思考。

雷颐

2004年岁末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目 录

中译本自序

译者序

第一篇： 一个近代中国人的教育

第一章： 成长期 3

第二章： 出洋 20

第三章： 从农学到哲学 31

第二篇： 文化碰撞

第四章： 基督教 41

第五章： 婚姻 63

第三篇： 政治观点

第六章： 世界主义 91

第七章： 中国政治 119

第四篇： 文化建树

第八章： 文学革命 165

第九章： 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185

第十章： 国学 210

第五篇： 结语

第十一章： 五四一代的历史透视 227

第一篇

一个近代中国人的教育

第一章 成长期

胡适于 1891 年 12 月 17 日生于上海,因为他的父亲来自安徽,所以按照中国的习惯,他被认为是安徽人。他的父亲胡传是清政府的一个小官吏,一个温和的学者,曾三度结婚。胡适的母亲是胡适父亲的第三个妻子,1889 年结婚时年仅十七岁,但二十三岁时就守寡了。胡适四岁丧父。他的同父异母姐姐比他母亲还大七岁,长兄比他母亲大两岁。父亲死后,家庭面临经济困境,充满了争吵和阴谋。但胡适却从个人痛苦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他的许多朋友都记得,他是位和蔼且随和的人。

胡适是早熟的,还不到三岁他父亲就开始教育他。四岁之前就在家乡安徽绩溪,开始了正式的学校生涯,那时他已能认近千个字了。他回忆道:“当时我是个病弱的孩子,如无人帮助,我几乎不能爬上六英寸的台阶。但我的读和记比学校中的其他儿童都强。”^①以他的年龄来看,他读的这些书是惊人的:《孝经》、《四书》、《诗经》、《易经》、《礼记》和《书经》。他母亲要求教师像他父亲那样,给他解释课文的意义,而不是像惯常那样死记硬背。对这种额外教育,他母亲要给教师多付两块钱的学费。胡

① Hu Shih,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in *Living Philosophies: A Series of Intimate Credo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1), p. 239.

适良好的国学基础,起码部分得益于这种早期训练。

当1900年九岁时,他熟悉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偷看通俗小说,虽然几乎大多数中国人在童年时期都曾花费时间,从传统小说的侠义、阴谋和爱情中得到享受,但直到20世纪初,这些小说仍被贬低为毫无道德和审美价值的读物。而胡适对这个领域的涉猎与其他许多年轻人的情况一样。一天,他在族叔的房中发现一部残缺不全的《水浒传》,立即把它读完,随后消化有用之处。他后来骄傲地承认,当十四岁在上海时,他已读了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像《三国演义》、《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样的小说。由于熟知这些故事的细节,所以他与那些要他讲故事的小姑娘很熟。一些年之后,他把他的中国文学知识极好地运用于他参与发动的文学革命。

胡适早年另一有影响的发展是一种朴素无神论的形成。他家中的女眷都笃信佛教,所以他还能记得她们的宗教活动,这是他强烈反对的。他后来回忆道:“我是在一种偶像崇拜的环境中长大的。”^①而第一次反叛是1902年他十一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春磨,亦无所施……”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得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②

不久,这种感受更加强烈。在宋朝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他找到了公元6世纪范缜写的反佛的一段话,范缜反对朝廷所赞许的佛教,认为人死后精神将被毁灭。胡适摘录了范

① Hu Shih,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p. 243.

② 胡适:《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73页。

缜的论点：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
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①

1904年，他企图砸碎村中的佛像以表示自己的信念；在其后来的一生中，反对佛教的感情绝未动摇。

1904年春，当他的一个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治疗肺病时，他母亲决定让他一起去，以得到现代教育。这个决定是重要的。20世纪初，变化之风已刮到安徽了，胡适说：“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②这明显有些简单化。1904年，孙中山已成为知名的革命者，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则为人熟知。曾经受到崇敬的科举制度现在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终于在一年后被废止了。大约八年后，存在了两千余年的皇权制将从舞台上消失。胡适离开他三十二岁的母亲不是一般的分离——说明了新观念非同寻常的影响。从他对半文盲母亲的这一决定的解释中，便可看出中国变化的深度。

在胡适离家赴沪的七天旅程中，“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而把整个世界留在后面。从他1904年春十三岁半离开家乡到他母亲1918年11月去世时的十四年中，他只偶尔与母亲相聚过三次，绝不超过六七个月。^③

上海是个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此，胡适再也不为科举作准备，而是接受了一种侧重点非常不同的教育。古典经籍虽未完全被学校摒弃，但确是非常少了。正是上海极大地拓宽了胡适

① 《四十自述》，第75页。

② 《四十自述》，第85—86页。

③ 《四十自述》，第86页。

的视野,并导引他到达另一个世界——美国。

若干年后,胡适形容上海在当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①。虽然是个商埠,20世纪前十年的上海已成为文化的中心。这个城市里拥有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一些颇具规模的出版业和诸如《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等有影响的报纸。这个大都市不仅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而且是不增多的出国留学学生的中转处。在这些年中,作为中国新观念和政治活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上海完全可与北京匹敌。在这种环境中,胡适度过了六年的成长期。

在这个城市的旅居中,胡适先后进入四所学校,学业斐然。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的频频转换,为了解这种时代氛围提供了一个晴雨计。它证明了当时激烈变动的气氛。清王朝即将垮台,各种思想观念瞬息万变,现实政治变幻无常,传统必将粉碎。对有抱负、有创造性的青年来说,这种形势虽然混乱不堪,却充满机会。而且,习俗与规范的迅速衰亡,也释放出了无限的能量,许多人都热衷行动,虽然缺乏一种确定感。总是非常自信的胡适抓住为他打开通道的有利时机:他没有片刻的犹疑和沮丧。

他首先进的是梅溪学堂,这里的课程与他在安徽的非常不同。除了国文外,还有英语和算学。由于国文优秀,六周后他升了四个班次。然后他进入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有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和生物。他的英语和算学总是班里第一名,获得很大进展。学了一年半后,他又转到中国公学。在这所学校,国文、英语、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和生物是他的一般课程。最后,他在中国新公学结束了在上海的学业,但却没有得到毕业证书。^②

这些年中,胡适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掌握英语和数学。在

① 《四十自述》,第86页。

② 《四十自述》,第154页。